

20世纪汉字简化之路(下)

◆ 蒋波

到 1958 年初,对简化字的反对与批评就成了政治问题。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》中,说:“在整风运动初期,一些右派分子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,说汉字简化搞糟了,群众都反对,要国务院收回成命,‘把汉字简化方案’撤回。右派分子攻击文字改革,自然是别有用心,他们是要借此向党和政府进攻,但是另外他们确实也是反对文字改革。汉字简化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,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对。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,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。”

即使在“文革”大潮的冲击下,汉字的简化之路也没有止步。1972 年,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与和 6 名同事被周恩来亲点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,继续从事汉字的改革研究工作。1977 年 12 月,《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(草案)》(以下简称“二简”)开始广泛征求社会意见,并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试用。由于“左”的思想影响,“二简”在制定过程中过于仓促、急于求成,又加之简化数量太多,一时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的使用困难。同时,汉字随意简化的思想在民众中间迅速蔓延开,民间自造、乱造简体字的风气愈演愈烈,社会用字一度混乱不堪。到 1986 年 6 月,国务院不得不正式停止使用《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》,并决定“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,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,以利于社会应用”。至此,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终归告一段落。

然而,“二简”字却没有因此而死亡,今天在一些中老年人的笔下

仍不时可以看到它们的残迹,如“少(餐)、迨(建)、祿(算)、午(舞)”等。更多的“二简”字被保留在中国人的姓氏中,如“闫(阎)、肖(萧)、付(傅)、代(戴)”等。

时至今日,简化字最大的优点——“易认好记”、“简便好写”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德籍华人学者彭小明曾撰文指出,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学发现,人脑是通过并行过程处理文字的整体图像,而非一笔一画地记录。汉字作为一个整体,就是同时处理的,简化字并不比繁体字好记。而简化字的推行,是以对那些未被收入的历史常见行草简字的禁绝为前提的。强调正楷,批判知识分子书写行草化、艺术化为不规范,为“打击和迫害劳动人民”、“迫害工农子弟”的行为,反而影响了书写效率。

简化字的扩张之路

拨乱反正后,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逐步走向正轨。1986 年 10 月,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(前身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)重新发布了《简化字总表》,在 1964 版基础上作了个别调整,收录简化字 2235 个,成规范汉字的标准。《简化字总表》共包括四部分,第一部分为 350 个不可用做简化偏旁 的字,第二部分为 132 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字,另含简化偏旁 14 个,第三部分为由第二部分作偏旁类推产生的简化字,共 1753 个,第四部分收录部分异体字和地名更改用字。

《简化字总表》收录的简化汉字并非信手拈来,而是采取“述而不作”,“约定俗成,稳步前进”的原则,即广泛借鉴采纳历史用字和民间俗



■ 丰子恺漫画《今非昔比》

字,真正的新造字数量少之又少。文字学家叶籁士、傅永和曾做过统计,现行的简化字中,始见于先秦的有 49 字,占 12.63%;始见于秦汉的共 62 字,占 15.98%;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共 24 字,占 6.18%;始见于隋唐的 31 字,占 7.99%;始见于宋(金)的共 29 字,占 7.47%;始见于元代的有 72 字,占 18.56%;始见于明清的共 74 字,占 19.07%;始见于民国的共 46 字,占 11.86%;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仅有一字,占 0.26%。

简化字初创之时,在海外一度引起轩然大波。1971 年,中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合法席位,简化字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官方使用文字之一,并由此逐步得到各国的认可。

早在 1969 年,新加坡就公布了与中国大陆相同的 502 个简化字。到 70 年代,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已经使用和中国大陆完全一致的简化字。泰国原本严令禁止华文学

教授简体字,但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,禁令也逐步取消,并于 1983 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

校都可教授简体字,发行简繁对照表手书。日本使用汉字具有悠久的历史。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。1946 年日本内阁公布《当用汉字表》,收字 1850 个,其中有 131 个是简体字(日本称之为“略字”),其余为传统汉字。略字中,与中国大陆相同的简体字有 53 个,如“体(體)、会(會)、学(學)、礼(禮)”;

相似的有 9 个,如“变(變)、迈(邊)、栈(棧)、齐(齊)”;

当然,也有完全不同的,如“囫(圖)”等。

在欧美国家中,简化字的实力由小壮大,影响力不断增强,形成了简体字和繁体字平分天下的局面,给外国人学习汉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但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增强,海外的大陆移民数量逐渐增多,加之孔子学院的推广,简体字的传播领域越来越广,很多

汉字简化的具体做法

“草书楷化”是最常见的原则,这类字往往根据汉字草书的笔画走势精简而成,如“书(書)、头(頭)、为(為)、东(東)”等;

“同音合并”即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,对同音字进行合并,如“发(發、髮)、后(后、後)、松(松、鬆)、干(干、乾、幹)”等;

“部件简省”则保留了一个字中最有特点的部件,而省略其他部件,如“声(聲)、气(氣)、广(廣)、务(務)”;

“符号替换”就是用简单的符号替换原字形中的复杂部件,如“汉(漢)、观(觀)、区(區)、赵(趙)”;

“废今留古”往往采用字形较简的古字形替代后起字形,如“网(網)、众(眾)、尘(塵)、云(雲)”;

“替换声符”是以较简部件替换形声字中的声符,如“运(運)、忆(憶)、邮(郵)、辽(遼)”;

“另造新字”,对于结构复杂的字形,多会另造字形结构明晰的会意字,如“惊(驚)、肤(膚)、护(護)、灭(滅)”。

国家的汉语教学机构甚至放弃繁体字教学。联合国也在 2008 年宣布所有中文资料采用简化汉字书写,而不再使用繁体汉字。

摘自《国家人文历史》2013 年第 17 期

感谢生命的美意

廖智



们把我姐推进去!不许你们把她的腿拿掉……”

他声嘶力竭的样子,让我的心也被牵扯得阵阵发酸。这个平时不善于表达感情的男孩,竟这样地爱护着我这个姐姐,我的眼泪也跟着滚落下来。我抓住他的手,问他:“姐姐要是没了腿,还是姐姐吗?”他拼命点头。我安慰他说:“那就别拦着医生了,让姐姐有机会活下去。”

接着,我便很迅速地被推进手术室。所谓手术室,不过是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帐篷。帐篷里有三个手术在同时进行。我做的截肢手术,按常规操作是要打全麻的,但在那时候,条件不允许,没有药,没有专业的麻醉师,就只能接受全麻处理。

在接受全麻时,我全身一直在发抖,又冷又怕。好几个医生过来按住我说,你不能抖啊,抖成这样,我们没法给你顺利推麻药。他们费了半天劲儿,才把麻药推进去,注射完毕之后,问我有没有感觉。我说好了,没有感觉了。其实,那个时候我很害怕,想睡,可又睡不着。整个手术的过程中我都很清醒,能听见他们所有动作发出的声响。直到开始听见电锯的声音,心里已极度紧张。我问,你们是在用锯子吗?他们说,是啊。我说,这是要锯我的腿吗?他们说,是啊!

没有任何东西遮住我,只有一个帘子挡住了我的肚子。隔着那个帘子,我就要永远地告别我的双腿了。电锯的声音清晰地传来。我,害怕极了。手术的时间比我想象中漫长。

如果手术的过程中,我能一直睡着该多好,可越想睡就越睡不着。其中有一段时间,好不容易睡着了,再醒来,以为手术肯定做完了,却没想到一切还在继续。截右腿的时候,医生问我,膝盖你还要保留吗?你的右腿伤得太严重了,如果保留就有可能造成感染,一旦感染,就更难保住了。我说,不管怎么说,现在还没感染,请先留住我的膝盖吧。

就这样,我一边做着截肢手术,一边跟医生们聊天。地震之后,经历了太多的抢救和手术,他们每个人看上去都已精力透支。最初,我鼓起勇气和他们聊天,只是不想让他们因为过度疲劳而在手术过程中睡着。聊着聊着,我自己竟然也开始轻松起来了。

46.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

余国伟说:“我们能见一下吗?”“你想和我见面吗?”袁广义显然对余国伟的这个建议非常惊讶。“正因为你不再是我案子的办案法官了,我才会要求和你私下见见面。”余国伟抢着说道,“袁法官,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点建议。”

电话里好一阵子没有声响,隔了大约一分多钟,袁广义说道:“那好吧,余先生,我下了班直接去你住的宾馆。我来见你的事,千万不能向任何人提起哦。”

七点刚过的时候,余国伟听到门铃叮咚一声响,急忙从沙发里弹起身来,走过去拉开门一瞧,正是袁广义。

袁广义进来后,朝着室内看了一遍,确定房间里没有其他人,他将公文包放到一边说:“我本来就要碰你一个面的,得把你给我的那些材料还给你。”“能告诉我案子接下来由哪位法官承办吗?我会面临什么情况?”余国伟直截了当地询问。“余先生,按理说我不该来见你的,不过我感觉你这个人还不错,所以我想给你几句忠告。拿你的案子来说,不在于你究竟有没有理,而在于办案子的人屁股往哪边坐。”“我明白。”余国伟点点头。

“你要要有心理准备,我退出这个案子,可能反而对你不利。”袁广义欲言又止地看了余国伟一眼。“我已经有这种预感了。”余国伟坦率地承认。“干脆告诉你吧,”袁广义像是左右为难后狠下决心似的说,“接手这个案子的是我们庭的副庭长,他和黑金事务所的关系非同一般。通常来说,只要他亲自参办案子,那么结局就已经明白在那里了。”

余国伟的面色顿时变得十分严峻,他皱着眉头问:“你是说我必输无疑?”“除非你能找到特殊的关系,向我们副庭长打招呼。”余国伟轻轻点头,像是自言自语地道:“这么看他王根宝真的在最高院有非同一般的关系了。难怪他那样有恃无恐。”袁广义看到余国伟脸上的表情既愤慨又无奈,忍不住问道:“余先生,你是不是已经移民外国啦?”“是的,我现在住在加拿大。”余国伟说。“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关系,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,但不知有没有用,”袁广义像是动了恻隐之心。“请指教。”余国伟赶

忙说。袁广义思索了一下建议道:“你可以试试以海外华侨的身份向上面有关部门反映情况,比如中纪委,国务院侨办,还有我们最高院院长等等。不过动作一定要快。”

余国伟接到陈秋表妹贺晶晶的电话时,一下子没有听出她的声音。贺晶晶说:“余大哥,你手上有笔吗?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,你记一下。”贺晶晶讲了一个电话号码,说道:“这个人姓刘,叫刘豪杰。他今天从温哥华出发飞北京,明天下午能到达首都机场。这个人有可能帮得上你的忙。”

第二天晚上八点左右,他的手机自己先响了起来。“你好,是余先生吗?我姓刘,叫刘豪杰。”“哦,是您啊,”余国伟小小地吃了一惊,“没想到您会先打电话过来。”“余先生现在有空吗?我们见一面,把你下榻的宾馆和房间告诉我,我过去找你。”

刘豪杰是隔了半个多小时到的。门外站着一位衬衣西裤、风度翩翩的绅士,年纪在四十刚出头的样子。他伸出长长的手臂来自我介绍说:“我是刘豪杰。”

刘豪杰边往客厅的沙发里坐下去,边再次上下打量了余国伟一番。随后问:“余先生,听说你在北京遇到了点麻烦?”“不瞒您说,确实有些不顺。”“说说吧,看我能不能帮上忙。”

余国伟就把那场官司的经过简明扼要地对刘豪杰讲述了一下,然后道:“本来案子已经结了,都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,没想到对方最后又申诉到了北京最高院。对方好像很有办法,搞定了最高院的关系,目前情况对我不太有利。”刘豪杰始终盯着余国伟的脸,听得十分认真,听完之后,他微微一笑道:“这件事托我帮忙算是烧香找对了庙门。我听下来,你只是在维护你的合法权益,只要走正常的途径去制止他们就行。”刘豪杰充满自信地表示。

“不知刘先生有什么办法。”余国伟试探着问。“我们去找最高院的纪检委书记。”刘豪杰爽快地回答。“纪检委书记?能见到他吗?”“没问题,我们很熟。”刘豪杰也不遮着藏着,直接把底牌亮到余国伟面前,“到时见着他,你只需如实向他反映情况就可以。他这个人铁面无私,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”

生死对决

柯兆龙

